

父亲的梦

■李郁

我的祖上都是贫苦农民，能过上温饱的生活是祖辈们的最大愿望，所以不会奢望学什么文化。父亲年轻时在西北军当兵，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却常为没文化而痛苦，希望他的儿子能有学问，这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想。

1960年，父亲把7岁的我送进学校。上学后，我用父亲给我买的粉笔、铅笔，把家里的墙上、门上、柜子上、床帮上都画得满满当当的。父亲不仅不烦，还特别欣赏我胡乱画的东西，说这一道儿写得平，稳当；那一道儿写得直，有劲儿。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励。

因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，我学得很快乐。老师第一次让我们造句，就夸我用“蹦蹦跳跳”一词造的句子像一篇小作文儿，这真是永远难忘。从那时起，我喜欢上了语文。我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几名，父亲为此感到特别欣慰。

有一次，我因作业完成得不好，放学后被老师留下做作业，耽误了吃饭。这对我来说虽是第一次，但对学生来说是常事。但万万没想到，我刚出学校，父亲正黑着脸在路上等我，我虽觉得不妙，还是径直走到他跟前，他猛地抡起胳膊来，狠狠地把我掌甩在我脸上。父亲抬手还想打，可再也没抬起来，他眼里涌出了泪水……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，父亲也只打过我这一次。

没过几天，父亲把一支油绿色的“新农村”牌钢笔递给我，我高兴极了。那时，比我家境好得多的同学也没钢笔用，那可真是宝贝啊，上学、放学我都把它握在手里。可是我还没乐一星期，新钢笔就在学校里丢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父亲长叹了口气，没说什么——

新钢笔丢了，我很愧疚，所以更加努力学习。有一天夜里醒来，听到父亲和母亲在说话，母亲说：“这孩子好上学，别长大了怕干活啊。”父亲说：“照这样下去，这孩子准能考上大学。我算好了，他不到20就上大学了。”母亲说：“唉，他托生到咱家算托生错地方了。”父亲说：“只要他好好上，咱砸锅卖铁都愿意。”母亲没接父亲的话。

小学快毕业时，双目失明的母亲劝我要上学了，她说能认识几个字就行了。母亲还说：“我这一辈子啥也不图啊，就图你长大后，我老了的时候，咱家盆里不断米面，灶窝里啥时候都有柴禾烧。”我问父亲还让我上学不让？父亲说：“只要你能上到大学，我拉棍要饭也能供养你啊。”

1970年冬我初中毕业时，升高中都不需要考试了，要靠推荐，因为家庭的原因，我上高中的希望彻底破灭。父亲知道后显得很凄然，他意识到我可能永远不能再上学了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就好好干活儿吧。”那几天他的话特别少，我感到他一下子苍老了好多。

我打算边干农活、边学高中课程，就到处找书。高中的书没找到，却找到了大学的教材，我就先自学了王力编著的《古代汉语》。

母亲一看我不上学了还在读书，非常恼火，问我看书到底有什么用，我答不上来。她给我讲了不让我读书的道理：读书是富人家孩子的事，穷人家的孩子读什么书啊，穷人家的孩子要下地割草、拾柴。

我点煤油灯看书，她一万个不同意。她说，看书只能趁夜里纺棉花的灯，咱家纺花又不点灯，你咋能一个人点灯看书啊。她时时防着我点灯看书，我不得不早点上床睡觉，等母

亲睡熟了再起来点上如豆的油灯。

有一次，她摸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书，知道我仍在看书，一下子把书撕得粉碎。那是我借人家的书啊，我难过得大哭了一场，感到母亲太残忍了。以后看书，我格外小心，把书放到她摸不到的地方。

1976年底，父亲因病卧床两年了，一次昏迷后被喊醒，他看了看我，对我说：“我做了个梦，看见你背着包袱去远地儿上大学了。”我的泪一下子流了出来，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他。几天后，父亲带着他的梦想和遗憾走了。

为了生活，我到大队的窑场打砖坯、挣工分，那是累死人的土工活。1977年初秋的一个傍晚，我正在泥盘上盘泥，队里的大喇叭响了，播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我一下子愣了，认真听完后，皓月当空，该回家了，可一动身子，才知道自己还在泥里站着。从泥里拔出脚，掂来两块干砖坯坐下，我思考了许久。最后，我又想到了父亲的梦，我一咬牙，只要有口气，我一定要考大学。父亲的梦给我了决心和勇气。

于是，我到处找书，找高复习资料。

为了考上大学，我拼命地学习。冬天，我用被子包着脚，坐在一盏小煤油灯下看书，头发不知被烧了多少次。夜里看书到很晚，白天还要上窑场挣工分。自学高中的数学时，遇到想不通的地方，在偏僻的农村想找个人问问都找不到。我累得口内生疮，舌干如刺，老中医让我喝黄连熬的汤药。日子再苦，只要想起父亲的梦，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。

当时，大多数亲戚朋友都支持我，但也有人说我是有劲没头儿使了，说我没上过高中咋能有高中水平，要是初中毕业能考上，那谁还让孩子上高中啊？这些话对我已没什么感觉了，考上侥幸，考不上认命，我已心如顽石。

1977年我参加高考，虽没被录取，但给了我很大激励，我更自信了。一贯反对我读书的母亲也开始支持我复习再考，她对别人说：“反正管不住他看书，走了也好。”为了让我专心看书，她不让我做饭，自己摸着也要给我做的。我出去时，谁要去我家，她总吩咐人家别碰我的书。

1978年春天，我到公社高中插班复习时，背了几十斤红薯面交到学校里，换成馍票。每到吃饭时，我就抓几个硬如砖石的红薯面馍，就着校园里的井水吃，但我自得其乐。

高考分数下来后，我达到了本科录取线。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本科和专科，本着要上就上名校的想法，我只报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。后来改报志愿，被原周口师专录取。有人告诉我，本科是4年，专科是3年，都是大学。我一听高兴极了，上3年也是大学，还少挨一年饿。我知道大学生月供30斤粮食，我是吃不饱的，而且家里也根本没能力贴补我。

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到家，母亲说：“要是你叔（我称父亲为‘叔’）能活到现在多好。”

临行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来到父亲坟前，回忆起父亲的梦想和对我的期望，我虽然考上了大学，可是父亲的梦还是未能实现——让我不到20岁考上大学。我跪在坟前，烧了好多纸钱，我流着泪说：“叔，我尽力了！”

父亲去世40年了，我虽没实现父亲的梦想——不到20岁考上大学，可他的孙子替我完成了，我的儿子18岁那年考上了一所“985”大学。

如父亲泉下有知，还会感到遗憾吗？

乡村老行当的变迁

■朱祖领

“拿头发换针，拿头发换针。”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这是三四十年前卖货郎走村串巷的叫卖声。卖货郎的篮子里只有针、线、顶针、染料、糖豆等，妇女们把梳头时掉的头发积攒起来，听到这叫卖声，便拿着头发去和卖货郎换成针和线。一起跑过来的小孩子，卖货郎还能给他们一两个糖豆吃。卖货郎一天能赚多少钱呢？三五角钱足矣。

下乡铜缸、铜盆也是一种生意，谁家的缸和盆烂了，先放起来，听到有“铜缸、铜盆”的吆喝声，就拿出来，让其锔。工匠会根据缸和盆的大小，先准备好各种锔子。下乡接活后，搞好价，先在缸叉子上打眼，再把缸叉子对好，用锔子扒着钻的眼，用锤轻轻地把锔子砸到缸上，成为一体。最后，用水和石灰粉抹缝，边抹边神秘地说着：“海水刺猬尿，抹上就不掉。”工匠一天也就收入三五角钱。

每年一入腊月，劈树疙瘩的人就下乡了。农村过年烧柴多，存有树疙瘩的户就把树疙瘩拉出来。腊月天，劈柴的汉子把棉衣一脱，光着膀子，喊着号子，抡圆了斧头，一下一下地劈，树疙瘩一蹦多高，劈柴人累得满头大汗，一天也就挣三五角钱。劈好柴，吃饭时主人端来黑馍馍和酱豆、辣椒，劈柴人被辣得再流一次汗。

卖小鸡、小鸭的都肩挑着叫卖。他们挑着长长的翘起来的重担子，裤管高挽，装束麻利，扁担有节奏地颤动着。他们快步前行，腿肚子上沾满了鞋底甩上来的泥土。

磨刀师傅肩扛着带磨刀石的长板凳，走街串巷高声吆喝着：“磨剪子来抢菜刀。”磨完菜刀和剪子，吃饭的时候也只得到一个馍或一碗汤。在一家吃不饱，磨几家的剪子和刀才能吃饱。磨刀师傅一天只挣几角钱。

做蒸馍拍子、馍箱子的，一个冬天早晚会加班，赶几个年集，只卖几十元；扎灯笼的加一个冬天的班，赶到元宵节把灯笼卖完，得二三十元就了不起了；卖豆腐的挑着沉重的挑子边走边喊，只赚个豆腐渣；拉盆的冬天冻死人、夏天热死人，日夜兼程，风餐露宿，生意快了赚个块儿八毛，生意迟了搭工、搭时又亏本。

邻村一个卖醋翁，做得一手好醋。平时做醋，煮料、发酵、淋醋，发酵时夜里要起床翻缸，休息不好，眼睛常红红的。有一次他下乡卖醋，每天该去的地方还没走一遍呢，眼看醋桶见底了。在越过一条小河时，他舀了两三瓢河水兑在了醋里。别人买醋时发现醋里有小鱼，问他怎么回事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本来就有口吃的习惯，这一回更说不出话来了。自那以后，每次去那个村卖醋，人们就故意问他：“今天的醋里有鱼没有？”

纵观五六十年来农村小生意的变化，确实很大。首先是销售形式的变化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人们肩挑、手提，沿街叫卖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有自行车拖带，后来用上了三轮车和架子车；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有用摩托车拖带的、用用手扶拖拉机带马车或架子车的。近年来，小货车把各种货物送到大小超市，游动叫卖变成了在代销点、经销店、超市售卖。其次，货物的品种有了飞跃发展。比如儿童零食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农村仅有饼干，且就一种样式，而现在，一个中型超市的儿童零食就有几百种。再是营利有了变化。过去，一天只赚几毛钱，现在不说大超市，光说乡村小超市，哪家不是楼房高耸，家有存款。

一个个古老的行当正在逐渐消逝，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，不断有新事物出现，也不断有旧事物消亡。那些逝去的事物，终将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。